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5.04.015

决科之利: 科举时代专经现象述论 ——兼论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

丁 修 真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241002)

摘 要: 科举专经,是指科举考试中所出现的科举群体对特定经书的依赖现象。该现象发端于唐,积淀于两宋,至元明而蔚为大观。学界对此虽已有不少关注,但就科举专经的历史演变,其所内含的科举意义等方面尚未见专论。相较于地区文化、经济等背景因素,科举人才的成功与专经取向的关联更为直接。科举地理所呈现的人才分布与地区差异,是长期以来科举专经制度与地方科举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 决科之利; 科举专经; 科举地理

对于历史人才地理研究而言,“确定一个人之成为某一方面的人才的主要因素来自何方,产生在何地”无疑是相当重要的问题。^①围绕此问题,学界已有不少相关的讨论。^②不过在部分研究中,人们往往习惯于固定的分析模式,从而使得结论上缺乏新意。^③以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下文简称“科举地理”)为例,通过对地区科举群体著籍地的统计与分析,进而探讨地区间的文化、经济差异,乃至地区学术史、家族史、地方社会流动等内容,已成为该研究的基本题意。只是学者惯论的地区差异、经济环境、家族学风等因素,究竟如何与科举人才的成功之间达成更紧密的联系,似乎仍需更合适的视角做进一步的阐释。

为此,笔者注意到,以下的一些研究,虽非专注于科举地理的讨论,却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艾尔曼发现,在明代早期科举录取中,《春秋》经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至明代中后期,这一优势地位逐渐为《尚书》取代。^④杨晋龙则指出,明代所有参加科考的士子,选择《诗经》的人数,一度达到总人数的34%。^⑤日本学者鹤城久章通过对明代乡试录的统计,将以上现象以“专经”概念命名。^⑥吴宣德则以明代会试录为基础,分析了明代国家科考五经的录取现象,为专经的产生提供了制度上的解释。^⑦而在科举家族的研究中,有学者注意到,经书的选择与世代研习,是科举家族形成的重要前提。^⑧陈时龙的研究,综合前人的问题意识,通过对明代江西安福县《春秋》经的考察,揭示了地域专经与地方科举之间的内在联系。^⑨

可见,上述研究所提出的“科举专经”现象(即科举士子的成功与否,与其选择的经典存在密切关联),实际上已触及“人才成功的因素如何产生”这一重要问题。鉴于学界目前对该现象尚未有系统的阐释,对该现象所内含的科举地理的研究意义更缺乏注意,本文拟就科举专经的历史进程加以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科举专经与科举人才之间的具体关联。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科举时代的专经现象

目前关于科举专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明代。故本文的讨论,亦先从明代的基本情况入手,然后再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代科考配额体系研究”(13CZS018)。

推而上溯,论其源流。

首先来看两则明代人的科考事例。第一则是李贽对其科考经历的回顾:

余自幼治《易》,复改治《礼》,以《礼》经少决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书》,竟以《尚书》窃禄。^⑩

另一则是嘉靖二年会元李舜臣的事例:

余年十二三时,先大夫议所读经,忆为三字入覆皿中,默祷于庭曰,《易》、《诗》、《书》、惟吾所当为。手焚香探得“书”字,余盖用《书》叨举进士。^⑪

李贽为福建人,李舜臣为山东人,二人地域不同,但科考经历颇为相似。李贽三度更换所习经书,最后以《尚书》中举,李舜臣则直接忽略《礼》与《春秋》,从《诗》、《书》、《易》三部经书中选择专研对象,同样以《尚书》中第。二人事例表明,明代五经中的《诗》、《书》、《易》似乎更为士子所钟爱,《礼》与《春秋》则颇受冷遇。其中原因,嘉靖十七年前后出任浙江提学御史的陈儒指出:

近来学者,因《礼》经卷帙浩繁,难于诵读,及因《春秋三传》迭出,而主司或主比,或主合,或主传,纷无定见,难以迎合,是故弃而之他经者往往而是,今不为之处,圣经几于孤矣。^⑫

可见,二经之所以不受士子所喜,原因就在于“卷帙浩繁,难于诵读”。昆山人顾潜于弘治十七年提学北直隶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

《春秋》、《礼记》同为圣人垂世立教之书,近时学者苦其卷帙浩繁,习者渐少,深惧久而愈失其传,提调官即同教官择诸生中年少资敏者令其改习。^⑬

那么,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又是形成于何时的呢?

揆诸文献,我们发现在北宋时期,人们便已意识到科举考试中存在“决科之利”:“人有习他经,既而舍之,习《戴记》,问其故,曰:决科之利也。”^⑭看来,在科举时代,追逐“决科之利”应该是科举士子具有的共识,只是时代不同,“决科之利”的内容也不一样。故要充分认识到这一历史现象,还需进一步考察其背后的历史成因。

明人指出,士子对《礼》与《春秋》的冷落,主要在于“卷帙浩繁,难于诵读”。这样一种“趋易避难”的科举现象,可以追溯至唐代。在当时的考试科目中,依据各经的字数篇幅,有大、中、小经的等级划分^⑮,各经的考核期限也不一样^⑯,其中《礼记》、《左传》二经因字数最多、篇幅最长而位列大经,考核时间也最长。也正是由于“春秋三传”及“二礼”过于冗长^⑰,在考试中不为士子所喜。开元年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道:“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即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⑱由此可见,时人争习“三礼”中篇幅最短的《礼记》,而《周礼》、《仪礼》无人问津的情况。同时期的杨场也指出:“今之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一二,恐左氏之学废,又《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亦请量加优奖。”^⑲为平衡各经的研习人数,政府也曾调整各经的录取与考核方式。例如在明经科的考试中,规定“若大经中能习一传,即放冬集”,即使如此,“学者尤十不一二”,“今明经一例冬集,人之常情,趋少就易,‘三传’无复学者”。^⑳

至北宋,专经的形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科举考试的一大变化,是逐渐确立起经义为主的取士标准。^㉑王安石变法,明确规定科举取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㉒开专经选士的先河。虽然新政不久便改弦易辙,经义作为取士标准也是屡有变更,^㉓但终宋之世,专经录取的考试方式一直得以保留。

专经试士,意味着士子只要专研一部经书便可折桂科场,使得“趋少就易”的风气更为盛行。南宋绍兴年间,时人指出,习《春秋》、《礼》经者已几于绝迹。^㉔对此,宋人一方面承袭唐人的做法,在录取环节上给予区别对待,^㉕另一方面,又设计了分经取士的办法,在考试中规定各经的录取比例,以此来引导士子对经书的选择与研习。此方法最早见于熙宁变法期间:

诏自今在京发解并南省考试,《诗》、《易》各取三分,《书》取二分,《周礼》、《礼记》通取二分。

先以御史黄廉言“前岁科场逐经发解，人数不均，若别试所治《诗》者十取四、五，治《书》者才及其一。虽糊名考校，务取实艺，然学者均受经业，不容优劣相远如此！乞自今于逐经内各定取人分数，所贵均收所长，以专士习。”故有是诏。^②

这样一种取士制度的出现，目的就在于保证专经录取的最低与最高限度，以免各经之间出现过于悬绝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政府在考试的录取排名、考题设置等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③上述举措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习《春秋》的人数有所上升。至南宋末年，专经的风气，已经由“《诗》者十取四、五，治《书》者才及其一”的局面转变为《尚书》独大。^④而在“以专士习”的引导下，专经不仅成为个人选择，更是成为家族科举的必经之路。叶梦得指出“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⑤在一些科举发达地区，专门于《诗》、《尚书》的地域专经现象也在逐渐形成。^⑥

经书的天然形态与士子“趋少就易”的本性，使得科举人才从科举制度设立伊始便对特定的经书产生了依赖。然而，专经的实质是“偏经”，这就使得国家在取士过程中不得不加以调整，从而产生了分经取士这样的制度设计。虽然该制度能够保证各经最低限度的录取人数，但也意味着选择比重更大的经书，将会有更高的中举几率。这样一种政策，引导着科举人才追逐“决科之利”，行之既久，遂演化为群体性与地域性的科举行为。

二、科举文献中的专经现象

为获得对专经现象更为直观的认识，接下去的讨论中，本文将对不同时代的科举名录加以量化分析，^⑦以考察以下的问题：一是专经现象在明代科举考试体系中如何体现？二是专经现象在不同时期又有哪些具体的差异？

笔者首先统计了明代南直隶 64 科乡试共 8899 名举人中式本经的情况，^⑧其中《诗》经的比例最高，共有 3225 名，占到了总人数的 37%，其次是《易》经，共有 2500 名，占到 28% 的份额，《尚书》1986 名，为 22%，《春秋》和《礼》分别为 643 人和 545 人，分别只占据 7% 和 6% 的比重。按照南直地区平均 4% 左右的录取率来推算，^⑨那么当时报考《诗》经的总人数将高达 8 万多人次，平均每一科选择《诗》经的人数在 1250 人左右。这一情况，体现了南直隶地区科举最主要的专经特征。

不过，分经取士的制度设计提醒我们，上述情况的出现，并不是自由竞争的产物，而是基于五经比例录取的结果。吴宣德关于明代会试的讨论已初步证明了这一点。^⑩在此，本文进一步对乡试的情况加以统计，并与会试进行比较，以求对明代情况的整体把握。

表 1 明代南直隶乡试、会试五经录取平均值

	《春秋》	《礼》	《尚书》	《易》	《诗》
明代会试	8%	8%	22%	26%	35%
明代南直隶乡试	7%	6%	22%	28%	36%

表 1 中的数据显示，在明代会试与南直隶的乡试中的五经录取比例相当接近。《春秋》的比例大概维持在 7% ~ 8% 之间，《礼》则在 6% ~ 8% 之间，《诗》比例最高，占据 35% 左右的份额，《尚书》和《易》分别在 22% 和 30% 左右变化。我们注意到，万历四十三年之后，明代各地解额数已经在开始调整，虽然南直隶地区的解额数一直趋于增长^⑪，但五经的录取比例并没有随之发生变化，这说明这样一种录取比例在明代科考体系中是比较稳定的。

明代的情况，还可以从清初的规定中得到反映。在顺治二年确定的各省乡试录取额数中，对当时江南省（即明代南直隶地区）的五经录取比例做了相当明确的规定：

顺治初年定京省各经中额。……江南《易经》五十四名，《诗经》五十三名，《书经》三十五名，

《春秋》十一名,《礼记》十名。^⑧

顺治二年确定的江南省乡试名额共有163名,^⑨以此计算,则《易》占33%,《诗》占32%,《书》占21%,《春秋》与《礼》分别为7%与6%。这一比例,与表1的数据相当接近。考虑到明代南直隶最后一科乡试,崇祯壬午科的解额数也为163,因此顺治二年江南省的解额数,正是对明代规制的继承。以此推之,江南省所规定的五经录取比例,应该也是承袭自明代。据此,我们便可根据清初各省的五经录取比例,推导出明代各地的专经情况。具体见表2。^⑩

表2 清初各省五经分经录取额数表

	《易》	《诗》	《书》	《春秋》	《礼记》	五经总数(清)	五经总数(明)
直隶	49	60	36	15	11	171	170
山东	23	35	20	6	6	90	88
山西	21	27	18	6	6	78	78
河南	28	34	17	8	7	94	93
陕西	20	27	20	5	6	78	78
江南	54	53	35	11	10	163	163
浙江	39	29	22	9	8	107	107
江西	40	32	29	6	5	112	110
福建	34	35	21	8	7	105	105
湖广	31	40	19	7	8	105	105
四川	21	30	20	6	6	83	83
广东	23	36	15	6	6	86	86
广西	15	18	17	5	5	60	60
贵州	10	12	9	5	4	40	40
云南	16	18	11	5	4	54	49

对比表2中所列清初与明代末科乡试解额数,可知清初的数字基本是在明代的基础上稍加损益,所以五经取士的比例也不外如是。此外,对清初科举试录的初步分析,也证明了这一推论。^⑪

由于明代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范本,使得宋元以来仅存的几部科举名录也有了分析的意义。因为通过比较,我们至少能够了解不同时代之间的具体变化。现存的宋代登科录中,可资专经统计的仅有宝佑四年一科,^⑫是科共录取进士601名,可考者570名,其中诗赋进士312名,经义进士258名。经义进士中,《诗》35人,《春秋》38人,《易》36人,《礼》36人,《尚书》113人。这一比例,反映了《尚书》为重的录取情况,而其余四经大致相当的录取人数,也证明分经取士制度在保证各经平衡方面,确实具有一定的效果。

元代的情况可见于《元统元年进士录》。^⑬其中所列的50名南人、汉人进士中,《诗》为13人,《尚书》为13人,《春秋》为10人,《易》为9人,《礼》为1人。这样的结果,反映出元代《礼》经的遭遇,比之宋代更为孤绝,《春秋》较《易》经录取还多1人,似乎摆脱了唐宋困厄的局面。而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指出,《春秋》在元代,确实受到了士子的追捧。^⑭其中原因虽尚不明确,但这样一种专经的风气显然延续到了明初。从洪武首科进士录取各经的比例来看,录取的120名进士中,《诗》29人,《书》24人,《易》18人,《礼》7人,《春秋》则高达39人,占五经录取总数的32%左右,^⑮依然可见元朝重《春秋》的痕迹。只不过,这样一种考试录取格局并没有持续多久,在稍后建文二年的会试中,《春秋》人数就已减少至17人,比重也降低至15%。至明终,《春秋》所占各科会试、乡试的比重始终维持在10%上下。

根据上述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科举专经这一历史现象,由于时代不一,决科之利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唐代呈现孤绝之势的《春秋》与《礼》一度困厄至宋,但在分经取士制度的引导下,略有回升。南宋末期,《尚书》成为当时最受士子欢迎的经典。但在随后的元代被《春秋》取而代之。从明代开始,整个科举考试的五经中式情况逐渐回复到唐宋时的景象,《诗》、《书》、《易》成为当时

录取比例最高的经书。清初基本继承了明朝的制度设计，直至乾隆年间专经取士制度废除。^④

三、专经与科举群体的产生

对专经现象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之后，我们再来重新讨论科举人才的相关问题。在各经录取比例固定的前提下，可以认为，科举考试的竞争，实质上是专经名额的竞争。士子对“决科之利”的追逐，其实是在寻求不同时期专经录取的最大几率。这就使得地方科举群体的产生，势必会呈现出对某一经书的依赖倾向。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科名鼎盛这一历史现象，学界已有详论。江南地区强大的经济实力、好学勤学的社会风气以及优良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其明清时期的科举盛况。^⑤因此，若要检视科举专经对于传统科举地理研究的解释效力，江南地区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为便于问题的说明，本文选取明代苏州与徽州地区加以比较考察。

表3 明代苏州府乡试五经中式比重表

	《春秋》	《礼》	《诗》	《书》	《易》
苏州府	109	90	460	229	866
南直隶	643	545	3225	1986	2500
比 重	16.9%	16.5%	14.2%	11.5%	34.6%

首先我们来看苏州府的情况。表3中，将苏州府的五经录取人数与南直隶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到，苏州地区中举经书最多的是《易》，共有866人，其次是《诗》，有460人，《书》、《春秋》、《礼》分别为229、109和90人。结果表明，只是在《易》经的中式上，苏州士子便占据了南直隶三分之一强的份额。这意味着，明代南直隶十八府州乡试《易》的录取人数中，每三人中便有一人来自苏州地区。因此，苏州府科举地位的凸显，应该是得益于本地士子在《易》经上的竞争优势。而前文提及的曾在直隶地区推广《春秋》、《礼记》的昆山顾潜，正是在弘治二年南直隶己酉科乡试中，凭借《易》经中式。^⑥

专经的中式情况在苏州府下辖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明代科举史上同样有重要地位的昆山，邑人杨循吉一句“吾乡多《易》”^⑦道出了此地专经的取向（见图1）。而与昆山毗邻、同样以科第闻名的常熟地区，专经的特征则显得有些特别。该地区《易》的中式率明显低于昆山，但在《诗》经中式上却尤其突出（见图2）。明代常熟地区共考中进士171名，在江南地区县级区域中位列第八，^⑧举人385名，在县级区域中排名第三。^⑨通过对常熟地区309名举人中式情况的分析，发现《诗》经中式比例高达76%，其次是《尚书》和《礼》，各占9%和8%，《春秋》和《易》只占4%和3%。可见常熟科考的优势，主要体现于该地区士子较高的《诗》经中式率上。常熟举人孙楼在论及本地科考盛况时，也是不遑多让：“余邑士以善说《诗》名于吴，其解人顾也，不让西京之匡生。”^⑩而在邻邑的太仓人张溥看来，常熟在《诗》上的专经优势，在当时足以睥睨海内：“海虞学士家世传《诗》，海内以《诗》显者，皆不免诋呵。”^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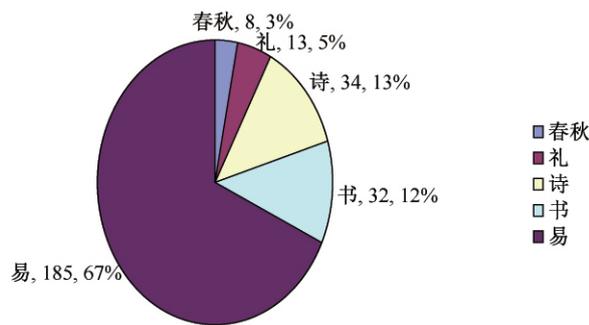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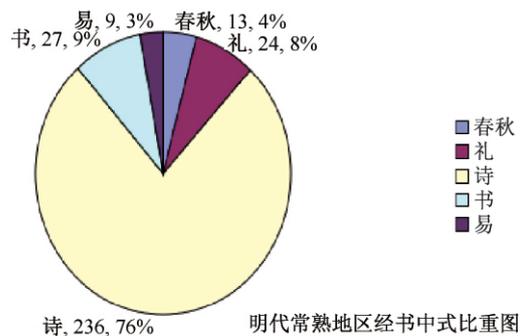


图2

与苏州地区相较,徽州府则是另一番景象。笔者共统计了839名明代徽州府本地中式举人,其中《春秋》中式人数最多,共有239人,占近28%的份额,其次是《尚书》,共有236人,《易》位列第三,共有150人,再次是《诗》和《礼》,分别为148人和66人。^②可见在徽州地区,饱受冷落的《春秋》成了举子们追逐的“决科之利”。不过,这样的专经特征,在徽州府下辖的各县域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在歙县中举的130人中,《春秋》为35人,《诗》30人,《尚书》32人,《易》25人,《礼》则只有8人,除《礼》外,各经中式较为平均。休宁中举103人,《春秋》为16人,《诗》18人,《尚书》18人,《易》46人,《礼》为5人,《易》经中式呈现优势。婺源地区,情况又有所不同,《春秋》为18人,《诗》25人,《尚书》76人,《易》42人,《礼》11人,《尚书》地位较为突出。而在祁门地区的121名中举士子中,《春秋》一便占据了84个名额。

从高级科举人才的数量上看,歙县与婺源是明代徽州府科考较为发达的地区。^③不过笔者通过对徽州地区科举人才数量时间变化的分析发现,明中前期,祁门地区产生的科举人才要明显高于二县,其原因应该与此时盛行《春秋》,而祁门士子又恰好以研习《春秋》见长有关。^④如成化四年戊子科,徽州府共考取12名举人,其中11人是以《春秋》本经中举。而从景泰元年庚午科直至弘治二年己酉科的14科考试中,祁门县学共考取45名举人,43人是以《春秋》本经中式。对于祁门一地的科举盛况,当时人曾评论道:

祁门,徽之属邑也,介乎众山之间,编户不逾五千,而其名特著于天下者,以科目人材也。他郡他邑非乏科目,而祁门特著者,以其多《春秋》也。天下之学《春秋》者众矣,而祁门独盛者,以其群居学校,受授有自而然者也。^⑤

祁门的事例表明,地区科举群体的规模与消长,与该地区士子的专经之业密切相关。不然,便很难解释为何在经济、文化并不优越的祁门,也曾一度占据着徽州府科考的领先地位。地方专经对于科举群体的影响,由此也可见一斑。

四、结语

通过科举文献的梳理与量化分析,大概可以确定,科举专经这一现象肇始于唐,积淀于宋,至元明而蔚为大观,涌现出了如昆山之于《易》、常熟之于《诗》、徽州之于《春秋》的专经之地。明代人吴宽曾对明代的地方专经现象有较为全面的概括,其谓“士之明于经者或专于一邑,若莆田之《书》、常熟之《诗》、安福之《春秋》、余姚之《礼记》皆著称天下者,《易》则吾苏而已。”^⑥其中的莆田、安福、余姚均为明代科举兴旺之地,^⑦作为江南富庶之地的苏州地区更是毋庸置疑。但偏居徽州一隅的祁门,自宋元以来便属科举欠发达地区,^⑧却能在明初一度占据徽州科举的翘楚,这样一种变化,恐怕只有通过“专经”的视角方能理解。而从唐至明的专经历史表明,科举史的形态固然会呈现出不同时代下的样貌特征,但科举专经可以视为贯穿科举时代始终的一个内在理路。这样一种视角,无疑能为我们审视唐代以来科举制度的发展,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科举地理现象提供新的路径。

注 释:

①葛剑雄《历史人才分布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三个问题》,《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0-34页。

②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05-426页。

③夏增民《历史学术地理刍议——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学术地理研究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73-78页。

④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701-703.

⑤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81页。

⑥鹤城九章《礼記を選んだ人達的事情——明代科举と礼学》,《福岡教育大學紀要》,第50號第一分册文科編。又见氏著《明代余姚的〈礼记〉学与王守仁——关于阳明学成立的一个背景》,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6-367页。

- ⑦吴宣德、王红春《明代会试试经考略》，《教育学报》2011年第1期。
- ⑧钱茂伟《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 ⑨陈时龙《明代科举之地域专经——以江西安福县的〈春秋〉经为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五分本第三分，2015年。
- ⑩[明]李贽《李温陵集》卷一一《易因小序》续修四库全书本。
- ⑪[明]李舜臣《愚谷集》卷六《四经读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⑫[明]陈儒《芹山集》卷二四《学政条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 ⑬[明]顾潜《静观堂集》卷八《提学公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⑭[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9页。
- ⑮[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5页。
- ⑯如国子监规定“习《孝经》、《论语》限一年业成，《尚书》《春秋公羊》、《谷梁》各一年半，《周易》、《毛诗》、《周礼》、《仪礼》各二年，《礼记》、《左氏春秋》各三年”。《唐六典》卷第二一《国子监》，第559页。
- ⑰“《左传》卷轴文字，比《礼记》多校一倍，《公羊》、《谷梁》、与《尚书》、《周易》多校五倍。”（《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三传》，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398页。）
- ⑱《唐会要》卷七五《贡举上·贴经条例》，第1376页。
- ⑲[唐]杨瑒《请定帖经奏》，《全唐文》卷二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27页。
- ⑳《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三传》，第1398页。
- ㉑唐宋以来科举考试科目的调整及经义诗赋考试标准变化的研究，可参见何忠礼《南宋科举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陈秀宏《唐宋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的相关论述。
- ㉒[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18页。
- ㉓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110页。
- ㉔绍兴三十一年，礼部郎中王普论取士分科之弊，“以为后生举子，竞习词章，而通经老儒，存者无几，恐自今后，经义又当日销，而《二礼》、《春秋》必先废绝”。见[宋]李心传《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〇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170页。
- ㉕如《尚书》、《周易》因“经业不广”，“各问疏义六道，经注四道、六通为合格”，“《三礼》《三传》所习浩大，精熟尤难，请问经注六道，疏义四道，以疏通三以上为合格”。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〇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353页。
- ㉖《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六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284页。
- ㉗宋宁宗嘉泰元年，臣僚上言“近岁有司专尚《春秋》，盖复《春秋》习者少，姑务诱进。岁月积久，假借太过。今岁诸处多以《春秋》首荐，而西蜀类试十名之前，辄占其三。《春秋》虽有三传，士子临时结社，相与分记，况其巨题绝少，易以牢笼。乞今后所考《春秋》，有经旨通明，文辞卓异，不妨巍占外，傥其所与诸经无大相过，不必置在前列。其取人分数，比之诸经，不得侵额。”（《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四，第4324页）按，此疏建议取消《春秋》录取中的种种优待，表明政府之前在录取人数、考题等方面已有相应的调整，且有所成效。
- ㉘《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第3640页。
- ㉙[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5页。
- ㉚如徽州地区，此时已出现盛行《尚书》与《诗》的局面“皆以《诗》贡于乡，徽之《诗》学遂甲江左，然《书》经最多。”见[弘治]《徽州府志》卷六《选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1982年。
- ㉛在此有必要对本文的统计数据做一番交待。本文数据主要采辑于明代乡试录汇编《南国贤书》（台中央图书馆藏清抄本），该书收括了明代南直隶七十余科乡试录，其中成化甲午科至崇祯壬午科连续58科乡试录取名单在其中得以保存，较完整地呈现了明代南直隶地区乡试科考的历史面貌。另鉴于该书中对明代初期乡试录收辑的缺失，本文也利用了方志中的科举名录中的记载加以增补。下文所涉及的科举人数的统计，若无特殊说明，均依据《南国贤书》。
- ㉜郭培贵《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考述》（《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统计，明代南直隶乡试理论上共产生举人11338名，本文搜录人数占理论总人数的78%。在此只做现象上的说明，而非人数的廓清。
- ㉝郭培贵《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
- ㉞见前引吴宣德文。表1中的会试数据亦引自该文。
- ㉟汪维真《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
- ㊱㊲《科场条例》卷一九《各省乡试定额·分经定额旧案》续修四库全书本。
- ㊳顺治十五年戊戌科共录取进士400名，其中《易》120名，《尚书》85名，《诗》136名，《春秋》31名，《礼记》28名；各占比例为30%、21%、34%、7%、7%。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会试共录取进士209名，其中《易》60名，《尚书》48名，《诗》71名，《春秋》16名，《礼记》14名，尽管人数减少，但各经比例仍为28%、22%、33%、7%、7%（《顺治十五年会试录》、《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会试二百九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见《中国科举录汇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第十二册、第十三册）。这一比例，与明代会试五经录取的平均值相当接近。

- ⑩《宝佑四年登科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⑪《元统元年进士录》,陈高华等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四卷《辽金元》,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21-931页。
- ⑫桂栖鹏通过对六十六种元代进士经学著作的考录,发现其中《春秋》占据大半,并指出元代进士登第,很多情况下都是以《春秋》起家。见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7-138页。
- ⑬胡吉勋《洪武首科进士研究》,《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
- ⑭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开始,会试以五经轮流作为考题,不再以一经专门为之,而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考生报名时择定专经,并就各经作答之情形已不再,代之以每三年选定一经,从中命题。专经的历史也就此终结。(艾尔曼《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62页。)
- ⑮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
- ⑯[明]张朝瑞辑、许天叙增补《南国贤书》卷二,《金陵全书》乙编,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273页。
- ⑰[明]杨循吉撰、蔡斌点校《松筹堂集》卷八《明故汝南袁君墓志碣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80页。
- ⑱见前引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特色分析》文。
- ⑲丁蓉《明代南直隶各县举人地理分布的考察》,《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 ⑳[明]孙楼《百川先生集》卷一《钱经元窗稿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㉑[明]张溥《皇明诗经文选》,《七录斋诗文集·文集近稿》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 ㉒由于《南国贤书》中明代初期乡试录的缺失,此处利用了[弘治]《徽州府志》中的举人名录加以增补。
- ㉓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 ㉔丁修真《明代科举地理现象的再认识——以徽州府科举群体为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 ㉕[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二《词翰》二《祁门县重修庙学记》。
- ㉖[明]吴宽《家藏集》卷三四《三辰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㉗明代莆田共产生进士502名,为明代进士数最多的县级单位,余姚323名,位列第三,安福204名,排名亦进入前十。见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 ㉘元末精通《春秋》的大儒、徽州歙县人郑玉曾言“新安士习惟婺源为盛,每三岁宾兴,州县望烟而举,士子云合响应。休宁次之,歙次之,绩溪又次之,祁门与黟其最下者也。”(见[元]郑玉《师山遗文》卷一《送汪德辅赴会试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 胡岩)

A Review of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in Examination Groups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s

DING Xiuzhen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held in South Zhili region in the Ming Dynasty. It presents a review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groups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and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regulated the imperial group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resources. Also,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in examination groups resulted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local examinations.

Keywords: examination groups; provincial examinati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